台湾清史研究一瞥

戎　笙

完成祖国统一事业，促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是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之一。大陆的史学工作者很关心海峡对岸的同行们，不少清史研究工作者希望了解台湾同行们在清史研究方面的基本情况。为此，就我所接触到的一些资料，分成下列几个问题，作一简单评述：（一）对清史研究的重视及其政治上的原因；（二）研究清史的主要机构；（三）档案的整理编目和影印问世；（四）图书资料特别是善本秘籍的收藏和出版；（五）对清史若干重大问题的观点；（六）其他。重点是第四、第五两个问题。由于我接触到的资料有限，思想理论水平又不高，重大遗漏或评述失当，在所难免。有不妥处，望读者指正。

（一）对清史研究的重视及其政治上的原因

台湾很重视清史研究，其重视程度仅次于民国史。重视清史的原因，主要是台湾当局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1949年底，国民党残部逃往台湾，惊魂未定，于1950年3月25日急急忙忙以“总统蒋中正、行政院长陈诚”名义，给已故台湾学者连雅堂先生的名著《台湾通史》发布褒扬令。《台湾通史》按体例说虽起自隋大业元年，但其内容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写的是清代台湾。蒋、陈二人的褒扬令借题发挥说：此书“足以振起人心，裨益世道，为今日光复旧疆，中兴国族之先河。”

1955年2月，台湾“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独立于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外，以加强清史研究。虽然台湾学者大多数主张中国近代史起于鸦片战争，但从《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刊载的论文看，从该所历年的科研成果看，实际上整个清朝的历史均在该所研究范围之内。在成立近代史研究所的同时，台湾“教育部”还明令把中国近代史列为各大专院校共同必修科（以后改为文学院修中国通史）。

1960年3月，台湾当局召开所谓的“第三次国民大会”，会上有270人联署提议纂修清史，并要求短期内完成。9月，由“国防研究院”的张其昀召集清史专家十余人，讨论编写清史的有关问题。11月11日张其昀就有关修纂清史事给蒋介石写了一个报告，主要意见是以《清史稿》为基础，把其中不符合国民党观点的加以删改。原呈说：“拟就《清史稿》中明清之际（按：指南明小朝廷）、太平天国及国民革命三时期，取材未善及书法失当者，本于‘中华民国政府’之观点，广采近三十年史学专家之认识，逐编审订，妥为修正，期能早日刊布。”如此仓促从事，不少有识之士表示反对，理由是“成书太急，曷不稍宽时日，从容润色，以求完备”。有人说：“今于干戈云扰之际，海岛书阙有间，陈实录外，一切档案皆不全，以言修史，似尚有待。”张其昀、彭国栋等人则抬出政治上的理由说：“且闻共党政权亦在编印清史，万一抢先一步，则歪曲事实，为害更大。”蒋介石批准了张其昀的计划：“照办。各大学教授中有史

学研究者，可多请参加，不分界限为宜。"11月下旬，匆匆忙忙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由张其昀任主任委员，肖一山任副主任委员，彭国栋任副主任委员兼总编纂。另有方豪、李宗侗、宋晞、杨家骆、蒋复璁、黎东方、简又文等二十人任编纂委员。虽然集中了台湾许多著名学者，但由于时间仓促，卷帙浩繁，一千多万字的巨著，要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脱稿并出版，当然只能是粗制滥造、照抄照搬。据该书总编纂彭国栋说："《清史》十分之八沿用《清史稿》。"全书由张其昀总其成，彭国栋通读一遍，肖一山只是挂名的副主任委员，没有实际参与其事，只补写了一篇600字左右的姜炳璋传。

《清史》一书是以"正史"的面貌出现的。为了使它的问世显得特别隆重，所以赶在台湾当局认为最有纪念意义的年月——1961年10月出版。此书从开始筹备到正式出版，完全出于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需要。在成文出版社出版的所谓仁寿本二十六史中，《清史》进入了正史行列。

《清史》出版之后，肖一山的《清代通史》，于1963年9月出版修订本第一版，此后一再重版，到1980年1月共出五版。全书400万字左右，分上中下三卷，精装五册，是肖一山毕生精力的结晶。该书初稿上中两册，成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册虽有初稿流传，但范围不广。肖一山到台湾后，集中全力，修改补充，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清史研究的第一位开拓者孟森先生的著作除部分遗稿外都已先后出版。其所撰《明元清系通纪》四册，台湾学生书店影印出版；《心史丛刊》三册，台湾华文书局影印出版；《明清史论著集刊》，台湾世界书局出版；《明代史》，中华丛书委员会出版；《清代史》(附录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海宁陈家、香妃考实）由正中书局出版；《明清史讲义》由吴相湘整理出版。

七十年代，台湾开始筹备纂修清代通鉴长编，由钱穆主持，陈捷先协助。1970年夏初开始搜集史料，先修太祖、太宗两朝。搜集资料范围包括清、明及朝鲜官书档案与私人日记、文集等，为此翻译了《旧满洲档》。他们先把各项资料摘抄成卡片，年经月纬，按日排比，列举纲目，附录史料原文，并注明出处。为了编纂清代通鉴长编，先后派人到日本、南朝鲜、英国去搜集资料。

1978年7月在台北举行了"清史档案研讨会"，参加此次会议的有美国、日本、苏联、澳大利亚、西德、南朝鲜、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清史学者共172人。这次会议共宣读了五十几篇专题论文。到会学者和专家认为，"清史研究已表明它将成为当今世界中国学研究的主流"。据说，台湾当局最近正在筹备于1985年再次举行这样大规模的清史学术讨论会，借学术文化交流的机会扩大政治影响，力图改变在国际上受到冷落的形象。

（二）研究清史的主要机构

从事清史研究的主要机构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所，除近代史研究所外，该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经济研究所、美国文化研究所也有一部人研究清史，或在专史研究中包括清史。

台湾"故宫博物院"是除近代史研究所之外清史研究人员较为集中的另一个机构。此外，还有一些大学如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政治大学、成功大学、东吴大学等等，也有少数人研究清史，或在教学与科研中包括清史。

这里着重介绍台湾"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始于何时，在台湾并无定论。

关于这个问题的代表性见解，以后再详细叙述。

台湾“中研院”现有十四个研究所，另有两个研究所在筹备中，研究人员总共约300人。其中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有七个研究所。据胡适任院长时说：“中研院”的经费，台湾当局拨款新台币2450万元，美国的援助折合新台币8740万元。这就是说台湾“中研院”初建时期的经费百分之八十来自美国。“中研院”现有院士100人，但只有20人在台湾，其余百分之八十长期在美国工作，并且有美国公民身份。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业务范围重点在鸦片战争以后，但鸦片战争以前也不偏废。该所研究人员计21人，出版物四种。一种是《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创刊，大致是每年一期，以发表论文为主，另有书评及学术报导两栏；二、专刊，主要出版该所研究人员的专著，如《清季中俄东三省界务交涉》（赵中孚著）、《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王树槐著）、《郭嵩焘先生年谱》（上下两册，郭廷以编）、《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李国祁著）、《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吕实强著）。另外两种出版物是资料性的，一是资料汇编，一是资料丛刊，详见下文。

该所的专题研究可分为四部分：一、国际关系；二、内政（包括政治、军事、财政、教育及各种制度）；三、文化思想（重点在中国受西方思潮的冲击后所产生的反应）；四、社会经济史。建所初期，选题偏重于第一、第二两部分，七十年代后期，才着重于第三、第四部分。

该所很重视专题研究，每一专题以完成一部专书为准。从七十年代后期起，该所开始进行了一个近代中国区域近代化的研究，时限从咸丰十年到民国五年（1860—1916）。区域研究是现代西方史学界一种时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我国近代化的历程，分析其成败得失”。区域的选择，一般以省为区域标准。主要选择沿江沿海最重要的地区，计有闽浙台、江苏、广东、湖南、湖北、上海、东三省、河北、山东、四川十个区。每一区由一名研究员或副研究员负责，从政治、经济、社会等的近代化着手进行研究。

（三）档案的编目和影印问世

大陆解放前夕，国民党曾有计划、有组织地挑选一部分清代档案和其他清史资料分批运往台湾。这些运台档案和资料，主要收藏于台湾“中研院”有关研究所和台湾“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各种档册，计有宫中档158497，军机档折包189906件，月折1442册，寄信档799册，电寄档16册，收发电档59册，各种剿捕专档95册，议复档65册，上谕档2846册，外纪档621册，丝纶簿237册，引见档65册，太平天国文件12件，旧满洲档40册，随手登记档153册，长编档3323册，起居注7784册，实录4355册，本纪791册，诏书20种50件，国书19件。

五十年代末，台湾故宫博物院开始整理康、雍两朝的部分宫中档，六十年代末开始少量公布，七十年代起陆续大规模出版，先后出版了光绪、康熙、雍正三朝宫中档及袁世凯、年羹尧、孙文成三人奏折的专辑，目前正在编辑出版乾隆朝部分。有关宫中档出版情况，见本刊1983年第3期《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宫中档述评》一文。

运往台湾的另一大宗档案是军机处档，计有32箱，包括五十四个年分。大部分是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总兵、提督、御史、八旗都统、副都统等因事或例行奏报各地方情形的奏章。由于奏报涉及的范围极广，所以军机处档案是研究清史的第一手好材料。

台湾故宫博物院于1969年3月出版了《旧满洲档》。该档共40本，其中37本是乾隆时发现

重抄、整理裱装的入关前的旧档，后来又发现另外3本，总共40本，正好太祖、太宗各占一半。档案所反映的时间前后30年（1617—1636），这次影印，编成10册，共5378页。书前有陈捷先的一篇长达5万字的序文。

据陈捷先介绍，这部分档案是用老满文写成，是满族入关前历史的原始记载，有助于我们了解被后世君主所讳饰或删除的重要史实，这是研究入关前清史的第一手好资料，其价值之高是无法估计的。同时对于满文字形与语言的演变，也是极有价值的资料。《旧满洲档》出版后，于1970年下半年着手译成汉文，现已全部译完。据参与翻译的张葳说："我们翻译旧满洲档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出版，而是配合本院正在从事的清代通鉴长编的编辑工作。""待清代通鉴长编完成以后，我们才能考虑到下一步是否出版的问题。"①

台湾故宫博物院大约在七十年代，完成了档案的整理分类编目，并全部摄制成显微膠卷。据说，他们计划选印一部分不见于《皇清奏议》、《皇朝经世文编》的奏章，抽印一些不见于《清实录》、《十朝圣训》的上谕，选印一些不见于《会典》、《会典事例》及各部《则例》的许多典章制度与法令，出版发行。不过，直到1983春，我还没有看到这类出版物。

运台档案中还有大宗外交档案，也是十分珍贵的。这批档案目前收藏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其中有清季总理衙门、外务部及民国政府外交档案。清代部分共有清档（指誊清装订成册的）六千多册，散档三千多包（多为原件）。其中较完整的、较重要的部分，已先后编辑出版。

到目前为止，近代史所共编纂出十八种史料。这十八种史料多半是根据清代外交档案编成的。例如：《海防档》主要是有关洋务运动（台湾许多学者称之为自强运动）的档案，包括购买船炮、福州船厂、机器局、电报、铁路五大类、十六开影印精装九册，时间自咸丰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861—1911）；《矿务档》八册，自同治四年至宣统三年（1865—1911）；《清季教务教案档》六辑共十九册，自咸丰十年至光绪二十五年（1860—1899）；《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十一册，自同治三年至宣统三年（1864—1911）；《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二册，自道光元年至咸丰十一年（1821—1861）；《四国新档》（俄、英、法、美）四册，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二年（1850—1863）。这些档案资料都是采自清代总理衙门档案。有的还利用了国外收藏的中文档案，如嘉道咸同《中美关系史料》三册，嘉道咸为一册，同治朝为两册，时间自嘉庆十年至同治十三年（1805—1874）。这套资料，除采用台湾所保藏的史料外，还收集了一部分英、美两国所保存的中文资料，比如英国的"国家档案局"就有许多中文资料。

近代史研究所藏书并不算多，但该所收藏有六千多显微膠卷，其中包括英美日德档案，如"参议院公报"、"众议院公报"、"日本外务省档案"、"美国国会文书"、"德国档案"、"莫理逊文书"，都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资料。尤以英国外交部F.O17档案，最为完备。该档原名"中国通讯全卷"，起于1815年，迄于1905年，包括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历任驻华商务监督等的报告及附件，中英南京条约以及英国历任驻华公使的报告及附件，中国通商口岸英领事动态事项。

历史语言研究所继续编印《明清史料》，即明清内阁大库残余档案，由李光涛主持其事，陆续出版了戊、己、庚、辛、壬、癸诸编。体例仍旧，每编一函，每函十册，每册100页（最近已出版精装合订本）。各编各册分类不甚严格，取舍也无一定标准。其中戊己两编20本，主要是有关台湾的历史档案；庚编10本，主要是清政府与东南亚各国交往的历史档案，还有少量西藏及西北等地的档案资料；辛编10本，都是明末的历史档案，自天启二年八月至崇祯十七年三

月十四日；壬编所辑，有明末农民起义，有土司事件，也有关于大小金川事件；癸编第一至第三本是明末农民起义，第四至第七本是清代章奏，第八至第十本是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

史语所编印的另一种档案为《明清档案存真选辑”，是作为该所专刊出版的，由李光涛主持，已出初集、二集、三集。

史语所整理档案的另一庞大计划，便是清内阁大库原藏法制档案的整理。由张伟仁主持，从台湾大学法律系挑选一部分学生参加工作一年到两年。他们从近十万件档案中，选出2287件有关清代法制史的档案。为了便于其它单位使用，逐件裱褙照相。然后根据档案内容分门别类，共分四门九类311个子目。除加标点外，还作注释和索引。全部文件整理注释，总字数在一千万字左右。再以子目为单位，利用其中所收各文件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撰写专题论文，计划每子目至少一篇，大约两百万字左右。他们为了整理和注释这批档案，编了一部中国法制史书目，十四个大图书馆为他们提供方便，共收有关中国法制史的书籍2352种，详列书名、作者名、册卷数、成书时间及最早版本、其它版本、作者小传、内容简介及图书馆书号等八项。此书作为史语所专刊之六十七，于1976年6月出版，16开精装三厚册，是一部很有用处的工具书。1983年9月出版了张伟仁的《清代法制研究》第一辑共三册，是该项计划的又一成果。

《廷寄》一书，内容都是有关清政府镇压林爽文起义的资料，是乾隆朝军机处承旨撰拟谕福康安的。系福康安后人售出，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作为台湾史料出版。由李宗侗作序，书前并附於梨华所作《林爽文革命研究》一文，全面介绍林爽文起义事迹。全书25万字左右，平装一册。可惜排校粗疏，错讹满目，使用深感不便。

（未完待续）

① 1955年开始，日本东洋文库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的《满文老档》陆续出版。系根据内藤博士影印沈阳故宫崇谟阁所藏者，为隆乾四十三年重抄并加圈点的“满文档子》，并非原档。（据广禄：《满文老档与老满文》载《幼狮学报》第一卷第一期）。

书 评

一部形象的历史人物传

——评《清太宗全传》

杨　　暘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装帖典雅而素朴的书，名曰《清太宗全传》（以下简称《全传》），它的作者是孙文良、李治亭。这部长达三十三万余字的专著，去年已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基于历史的及现实的原因，关于清太宗的研究实属清史领域中的一个空白。本书两位作者多年治清史，以清太宗为研究对象，积数年之所得，汇为巨编，从而为这一空白装填了新的内容。《全传》生动具体地勾勒了清太宗作为一代军事家、政治家和大清皇帝在明清兴亡史上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历程。书中从纵的方面按时间顺序，叙述了少年皇太极、天命时期的骁将、天聪时期的金国汗和崇德时期的大清帝；也从横的方面展现了清太宗所处的历史时代，他的思想、作风、爱好及家庭生活。作者都作了实事求是的反映和科学的评价。这部书是清太宗个人迄今最全面、最翔实的传记。它不仅是研究清太宗的新成果，同时，它对于清初发展史研究、满族史研究、明清战史研究，及满与汉、与蒙古的早期民族关系研究诸方面，开